

日據時期台灣「皇民化」運動的遺患和破除

◎ 鍾兆雲

一 日本殖民當局在台灣推行的「皇民化」運動，難以開花結果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為配合全面侵華這場所謂的「大東亞聖戰」，日本政府全面調整對台政策。日本據台總督、海軍大將小林躋造悍然宣佈在台灣建立「戰時體制」，並根據1937年9月近衛內閣的「國民精神總動員計畫」，在台灣通過《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綱要》，制定強迫全體台灣人民「皇民化」的方針。其主要內容包括：強化「皇民」教育，宣導「忠君（天皇）愛國（日本）」，強迫台灣青壯年接受軍事訓練，培養服從、好鬥的日本國民性格；禁止台灣人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檢舉「抗日思想犯」；廢除中式寺廟神祇和傳統節日，推行日本神社崇拜，衣食住行和日常生活充分日本化；禁用中國紀年，改用日本正朔；強迫作家和刊物創作、發表「皇民文學」，禁演傳統布袋戲、歌仔戲，大力推廣日本「皇民劇」；取締台民的一切民族民主運動，強制台民加入「皇民」組織等。

日本侵略者自1895年6月17日在台北成立總督府宣佈「始政」以來，就有計劃有步驟地對台民進行同化「改造」，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更提出「島民皇民化」的口號¹，處心積慮地推行麻醉政策。「皇民化運動」與此前的「同化」和「島民皇民化」可謂一脈相承，但把它作為一場運動發起並具體且殘暴地實行，小林躋造無疑是始作俑者。此舉表明，日本的台灣統治政策已取代了先前有步驟的「間接統治」，走向了另外一條極端道路，試圖一舉摧毀台灣民眾的民族意識，一夕而煉成「皇民」。「皇民化運動」是日本人在思想、文化上「改造」台灣民眾的頂峰，台灣由此進入受殖民統治最黑暗時期。

小林躋造瘋狂推行「皇民化運動」，使之覆蓋全台，妄圖通過「換大腦手術」的種種措施，把所謂「日本國民精神」「滲透到島民生活的每一細節中去，以確實達到『內（日）台一如』的境地」，使台灣人欣然參加天皇的一切指令和行動，台灣的人和地「都成為皇國的真正一環」²。

日本軍國主義企圖通過「皇民化運動」，要從物與心兩個方面徹底去除台灣人民原有的「漢民」民族主體性，挖掉台灣人民的「中國魂」和「中國心」，形成「皇民心理」、「皇民意識」、「皇民文化」，使台灣完全成為日本殖民地。但台灣人民自始而終，不曾停息反抗。對此，就連日本殖民當局也不得不承認與感慨，台灣人民的漢民族意識「牢不可破」、「似乎不易擺脫」³。祖國大陸在抗戰中的節節勝利，極大地鼓舞和激勵了台灣同胞的民族意識和抗日情緒。身處大陸的台灣同胞，通過書刊、廣播和台灣抗日團體，不斷發出台灣要求回歸祖國的呼聲。祖國政府、以國共兩黨為首的各個黨派及各階層人民也再三聲明：抗戰最終目標，包括收復台灣。1943年11月下旬中美英三國首腦在開羅會議簽署的、包含收復台灣等內

容的《開羅宣言》傳到台灣，在強烈激勵台灣人民鬥志之時，也使台灣人民清晰地認識到：這場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正是我們台灣同胞謀解放，擺脫亡國奴的恥辱和苦痛，重新變為台灣的獨立主人的大好機會」⁴。面對台灣人民反對殖民統治的種種言論，總督府於12月9日宣佈禁海，嚴密封鎖台民與外界接觸，以防「皇民化運動」瓦解。

苦難中有反抗，台民們在反抗中盼望光復。他們在根據各種各樣的消息分析日本即將戰敗時，偷學「國語」（普通話）蔚然成風。台灣末代總督安藤利吉大將在戰爭末期曾召集在台日人訓話，其云：「佔領台灣五十年。……如果統治真正掌握了民心，即使敵人登陸，全島化為戰場，台灣也會協助我皇軍，挺身粉碎登陸部隊。真正的皇民化必須如此。但是，相反地，台灣人萬一和敵人的部隊裏應外通，從背後襲擊我皇軍，情形不就極為嚴重？而且，據本人所見，對台灣人並無絕對加以信賴的勇氣和自信。」⁵

與那些忽略了台灣人民與對岸同胞血濃於水的民族情感，低估了炎黃子孫「夏不淪夷」的傳統信念的殖民主義者、軍國主義者相比，安藤利吉還算有「先見之明」，義不臣倭的台灣民眾是絕不可能達到侵略者希望「真正的皇民化」預期目的的。在沒有領袖、沒有組織號召的情況下，絕大多數台胞不約而同地以堅韌反抗精神，抵制狂吠不已的「皇民化運動」，使之難以開花結果，這是台胞對華夏強烈向心力的表現，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精神及華夏傳統文化堅韌強固，具有曆久長新的活力、巨大張力和強大凝聚力的生動例證。當年日本殖民員警在調查中發現，許多台灣人「開口便是強調中國四千年之文化，以激發民族自信心」。⁶

在「皇民化運動」中，帶有近代新式學校特徵的「皇民」教育和日本文化的灌輸，與私塾書房的漢學傳統教育及家庭中華文化的傳承，發生強烈碰撞、衝突、擠壓，雖以政權優勢取得了表面勝利，終未得以完全取而代之。中華民族幾經異族入侵而不致像古埃及、希臘、羅馬那樣沉淪毀滅，端賴於存亡絕續之交，有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精神支撐和導引，激勵人心於不死。在這中間，台灣許許多多的志士仁人以自己生命的全力，在曲折艱辛的歷程中萬轉千回，堅持忠貞大節，維繫中華傳統文化，延續民族精神，堅信民族存在一天，中華文化便不會滅絕，這是何等的可歌可泣！台灣人民堅決反對日本殖民統治、捨生忘死追求自由和愛國、愛鄉的崇高精神，為中國政府光復台灣提供了精神支持。

佔領一塊土地並不難，但要徹底征服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則難於上青天。1936年6月28日，終身致力於保存祖國文化、維繫民族認同，而耗時十年在日據時期寫出煌煌巨著《台灣通史》傳世的台灣一代學人連橫，臨終前仍不忘恢復故土之志，謂其子連震東（前國民黨主席連戰之父）曰：「如今日寇氣焰咄咄逼人，我預計中日終必有一場大戰。光復台灣即其時也。望你要勉力投入。」⁷

史學家連橫算是先知先覺了。當年甲午戰爭的失敗使中國失去了台灣，日本人拿著《馬關條約》踏上了台灣的土地，而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又給了台灣「物歸原主」的機會。台灣人民為光復而興奮，台北士紳林茂生在有日本員警監視的台北大會堂（今中山堂）演講稱：「漢民族是不可同化的！」首批接收台灣的中國官員到達時，從基隆到台北，台灣人民舉著國旗流著熱淚自發歡迎，隊伍排了整整三十公里。參加發起這場歡迎運動的台灣士紳陳陳忻說：「現在我們沒有別的，對祖國只有感謝，只有歡迎。」⁸有的台灣人士指出：「台灣人民永遠不會忘記祖國，也永遠不會丟棄民族文化！在日本人強暴的統治下，度過了艱辛苦難的五十年之後，我們全體台灣人民終以純潔的中華血統歸還給祖國，以純潔的愛國心奉獻給祖國。」⁹台胞為光復與回歸祖國表達的欣喜與歡迎之情，「讓人心裏感到熱呼呼的」，「台胞

對『國語（普通話）運動』響應之熱烈，出人意料，也感人至深」¹⁰。台灣民眾在光復時隨處可聞的熱切言談和到處可見的狂熱場面，是他們由衷的內心反映。

1945年10月25日，歷盡劫難、在半世紀抗日鬥爭中犧牲達六十五萬人¹¹的台灣，在兩岸人民的淚水歡歌中正式宣告光復。夢想征服她、「同化」她的日本殖民者，以有罪之身等待戰犯審判、被永遠驅逐出台灣前，在各式各樣帶有東瀛風情的古舊建築裏，聽著中華舞獅的喧天鑼鼓和中華國粹瑰寶的美妙旋律，看著台民們爭先恐後地將祖宗神主牌位請回來虔誠祭拜，只能黯然為「皇民化運動」敲響喪鐘。

日本五十年的「皇民化」，在光復那天就被吹走了。那些會講日語的台灣人，正如同有識者期待的那樣，是「留東五十年的老留學生」，光復之後「畢業回國了」¹²。台灣人民始終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族成員。這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強大凝聚力的偉大勝利。台灣光復後，日治時期終身不讀日文不說日語不著和服的台灣民族運動領導人林獻堂，率台灣致敬團到大陸參觀並祭拜黃帝陵，在晉見蔣介石時慨然道：「同胞在過去五十年中，不斷向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壯烈犧牲，前仆後繼，所為何來？簡言之，為民族主義也！」這算得上是這位有為有守的堅定民族主義者，對台灣人民包括反「皇民化運動」在內的五十年抗戰精神內涵，作出的精闢而獨到的概括。

二 「皇民化運動」的毒害和遺患不容忽視

「皇民化運動」從總體上講是失敗的，這點除了日本人自認不成功外，還可從光復初期台灣民眾箠食壺漿、敲鑼打鼓以迎「王師」的熱烈場面看出。但因其時間長、滲透深、手段惡劣、「教育」普及，還是給台灣人民心中造成了巨大的心靈創傷，而且給整個台灣社會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傷痕，其影響不可低估。

首先，它極大程度地破壞了中華文化和民族獨立精神在台灣的正常傳承、發展，在用武力和高壓政策為「皇民化」文化的灌輸營造土壤和氣候時，肆意毀棄台灣人民世代相傳倍為珍視的中華傳統倫理、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造成台灣一代人的文化斷裂和情感、心靈扭曲。

在這中間，「皇民教育」的洗腦「功不可沒」。日據時期的台灣青少年被強制用日語作為思想工具，他們中有一部分人完全在殖民式現代化教育「啟蒙」下長大，疏離並輕視被日本人惡意詆毀的「支那」、「清國奴」和中華文化，自小便從心靈和情感上打下崇日輕華的情感烙印，心底深處的戀日心態非一朝一夕所能消除。另有一部分人在中日兩種文化的衝突中，雖然也竭力保持「漢人原鄉文化傳統」，但也被迫吸收了大量日本文化和近代科學文化，形成雙重性格，民族情懷一時無從著落，柴田廉稱之為「迷失的羔羊」¹³。從馬關割台許多台灣人以鮮血和頭顱寫下的不願歸順的抗日史詩，到吳濁流筆下胡太明典型所具有的民族認同上一度徬徨無主心態的「亞細亞孤兒」，再到宣揚「皇民」煉成的小說《志願兵》和《道》，正說明了台灣老中新三代人面對日本殖民統治，呈現了複雜矛盾的多種不同的民族認同層次。後者以曾經「志願血書從軍」的李登輝為例，他從出生（1922年）到大學，受的是「皇民教育」，浸染的是日本文化，自幼以來習之有素、奉行不渝的皇民思想，使得「皇民」意識在他腦子裏根深蒂固；加上父親是殖民統治的「協力者」、兄長為皇軍「玉碎」，以及在日本統治架構內分得一杯羹的經歷，致使其「親日情結」已成花崗岩。

遲於李登輝出生的台灣一代，成長於日本統治穩固之後，沒有親身體驗日本統治初期的殘暴

一面，無所瞭解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暴虐，反而在曠日持久野蠻推行的「皇民化運動」特別是「去中國化」的「皇民教育」曆煉中，目睹了殖民當局表現的溫存一面，尤其對日本的強盛進步和中國的衰亂落後比較之後，其價值觀和人生觀難免發生錯誤傾斜，對積貧積弱的中國日益陌生，對國威如日中天的日本卻產生仰慕和嚮往之情，甚而熱衷「脫華入日」和「皇民煉成」，成為日本殖民地的現代新國民。

文化，有成型的東西，如文物典籍、文字語言、建築物等，也有無形的存在，如生活方式。在這兩點上，台灣處處可見日本殖民時代留下的影子，日本文化對台灣民眾的影響不容低估。

其次，1947年悲劇性的「二二八」事件，被「皇民」餘孽別有用心地利用並加推波助瀾；而1949年國民黨在台確立威權體制後對共產黨及大陸進行的妖魔化，以及兩岸分治敵對狀態的極端情況，再次對台灣民眾的情感造成創傷，加重了「親日情結」等一連串的心理變化。

台灣光復後，一部分受「皇民化」毒素影響較深的台灣民眾，對一夕變天遽然倒轉的情勢尚不適應，在國家民族的角色上也不能立時接受。而國民黨當局在政權交替之際，既沒有花力氣蕩滌「皇民化」的遺毒，又沒有抹平台灣民眾對「皇民化」存在的不同差異和矛盾心理，更沒有以親和力方式積極領導並引導廣大台民走上建設新台灣的通途，而是在打完中日戰爭後馬上投身反共內戰，根本無暇也無心經營台灣，讓台灣人民深為茫然和不滿。光復後的現實特別是國民黨在台政權的暴虐腐敗，與台灣民眾回歸祖國的理想和憧憬發生衝突，部分台民的熱情為此急速減退，從熱烈歡迎、滿懷希望，轉變為失望、不滿乃至強烈反對。其時間之短促、態度變化之快、反對程度之烈，卻未引起國民黨政權的重視和疏導，反而在1947年引爆了那場悲劇性的「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的主要因素固然是國民黨腐敗惡劣的政治文化引發民憤所致，但也不應忽視「皇民」餘孽在其中所起推波助瀾的作用，這點可從事件回應者有不少是台籍「皇軍志願兵」和深受日本影響的青年學生，而且一開始就不分青紅皂白地視大陸人為寇仇、極力排斥以國民黨所代表的漢政治文化這個情況可見端倪。「二二八」事件對台灣人民造成了心靈創傷，但客觀而言，此創傷只合對於當時心懷故國的中老年人而言。即使「台灣意識」強烈的葉石濤，也以「過來人」、「見證人」的身份說：「甚至在二二八事變這慘重的悲劇發生以後，台灣民眾仍然並未停止對祖國濃厚的愛。」¹⁴而對於那些頑冥不化、別有用心的「皇民」餘孽來講，「二二八」事件正是他們不做中國人進而唆使台灣民眾種下省籍之間的隔閡和仇華反華的最好藉口。幾十年過去了，「二二八」事件不斷被一些有意割裂歷史真相的人惡意強暴、誇張渲染，目的就是以此作刀子，讓一代一代台灣人加深仇恨，藉此肅清心中的漢族意識，從情感歸依上脫離中國。這點值得歷史反思和警惕。

「二二八」的創痕未癒，1949年國民黨政權敗逃台灣後以「防共」、「反共」為重要屬性，實行極權統治，並無所不用其極地將對岸的新中國描繪成妖魔之域，更是在台灣民眾中加大了陰影。在兩岸分治敵對狀態的極端情況下，連減了筆劃的漢字都陌生起來，文化共同體的中國概念因缺乏接觸和互動而漸趨模糊，以致到了20世紀90年代，台灣介紹大陸的電視節目都還帶著獵奇的眼光，其中一個熱門節目就直接叫「大陸尋奇」。台灣民眾為此迷惘，由此給日本「皇民化」遺毒的生存提供了空間，造成化不開的「日本情結」。在國際反華勢力的噪動下，一部分人將反對國民黨的情緒逐漸轉移到排斥外省人以至祖國大陸上來，而且與「皇民」情緒混合糾纏在一起，形成「台獨」的溫床。

第三，李登輝執政十二年，蓄意推行一系列「新日疏華」舉措，使隱性蟄伏多年的「皇民化」情緒借屍還魂，在島內死灰復燃，延續氾濫，危害甚巨。

在兩蔣執政期間，國民黨政權通過多年的中國式教育和宣傳報導，著力將文化觀念形態滲透到台灣社會，以對受日本殖民統治半個世紀的台灣民眾「進行『中國人』再同化的政策」，雖然在文化上「培養對『中國』的歸屬感方面與語言同化方面」取得了成功¹⁵，但因種種原因，未從根本上扭轉「皇民教育」的餘毒。「即使到了九十年代，李登輝這種日化台人的語言、心理和思考特徵仍然存在」¹⁶。而李登輝上台後，大量起用當年受日本人重用的殖民地特權人物的後代和經「皇民教育」出來的精英人物形成的「皇民階層」，還聘請一些對中國從來都不懷好意的日本人作其高級「政治顧問」，動用權力機器，依據「親日疏華」的意願改造台灣。這其中，他們在教育上推行所謂「本土化」以及發行新版教科書等做法，以切斷台灣年輕一代的歷史記憶和文化感情。這完全繼承了日本當年對台灣殖民統治時「亡國去史」的手法，實乃借屍還魂，以作「皇民化」之延續。

自我定位為「日本人」、「根」在日本的李登輝，為了繼續保持和加深「皇民意識」，還不遺餘力地在台灣推銷日本文化，使得日本流行文化通過強勢操作，漸成主流侵蝕台灣。作為台灣「總統」，李登輝「站在日本人的利益上講話，以日本人的世界觀、以一種與中華民族存在敵對的潛意識作為精神武器」¹⁷。李登輝所作所為的政治目標，就是延續日本殖民者當年的夢想，實現台灣的「皇民化」，在逐漸疏遠中國的情況下分離出去，建立一個合乎日本人口味的「主權獨立的國家」。

在李登輝的公然叫囂下，一些在日本卵翼下成長的「順民」如蟻附臚，吠形吠聲感念和頌贊當年日本的「德政」，極大地「復蘇」了一部分島民的「皇民意識」，跟著認賊作父，眷戀舊日「皇國」，而對當年殖民者在本島犯下的滔天罪行以及橫加「清國奴」之惡稱及卑視，居然得了歷史的遺忘症。

陳水扁上台後，繼承李登輝衣鉢，繼續不遺餘力地推行「文化台獨」。由於李登輝們「皇民化」的二次洗腦和誤導，新生代的一部分台灣青年，不知過去先輩抗日的慘烈事績，卻生長成了惟日本是尚的「哈日情結」。

第四，日本在戰後軍國主義陰魂不散，少數右翼勢力長期逆流而動，在鼓吹侵略有理、侵略有功的反動邏輯時，惡意染指台灣，妄圖使台灣青少年一代迷失歷史方向，重續「皇民」舊夢，為其戰略圖謀服務。

日本勢力在戰後被驅逐出台灣後，仍想方設法從各個方面對台灣施加影響，這從幾乎每年都會派一些國會議員赴台「考察」即可知曉。日本右翼政客岸信介、石原慎太郎、安倍晉三等發起的「青嵐會」、「日華議員懇談會」等親台組織，時時煽動日本和台灣民眾的反華情緒，明裏暗裏鼓動和支持台獨，處處為中國統一製造矛盾和難題，嚴重影響了兩岸關係發展的正常進程。

抗戰勝利和二戰結束後，日本把「為國捐軀」的2·8萬名「台籍日軍」送進靖國神社供奉。2002年底，日本靖國神社為擴大信奉會員人數，設想？在台灣設立首間海外分社，以促進「台灣老兵和日本老兵遺屬們的交流」，試圖通過與「台籍日軍」這批有特殊歷史身份的人建立情感紐帶來籠絡台島內親日分子。

由於地緣關係，在日本右翼勢力的介入和推波助瀾下，「皇民化」的流毒在台灣近年有死灰

復燃之勢，這從鋒頭強勁的「哈日風」可見一斑。雖然就大部分民眾而言，「哈日風」不過是一種「跟風潮」，純屬普遍現象，但一些被異化的「皇民」餘孽和有「親日情結」的少數學者，全方位迎合日本的需要，千方百計把這種「哈日風」上升到文化認同的高度，「從根本上割斷台灣與大陸的文化紐帶和血肉聯繫，為『台獨』做準備」¹⁸。

以日本漫畫家小林善紀美化日本侵台、宣揚「皇國史觀」、鼓吹台灣獨立的《台灣論》一書，居然能在台灣公開出版發行為例，除了說明島內仍存一批對日本及其文化頂禮膜拜的「皇民遺老」，還表明日本右翼勢力顯然想通過這類圖書來誤導輿論，使台胞特別是青少年切斷同祖國歷史與文化的聯繫，削弱中華民族意識，無法判別是非和認識自己，在陷入無知和短視中迷失歷史方向。台灣「哈日現象」最大的隱憂，就是「透過文化的認同，進而對日本產生認同，這種入侵不需一兵一卒」¹⁹。

第五，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強制推行的「皇民化運動」，加上李登輝們曠日持久的延續，在製造眷戀殖民統治的「皇民情結」這一惡果時，還對台灣大眾的心理造成無以復加的傷害，其惡劣影響一直延續至今。

日據時期，殖民當局對台灣民眾一方面以異族視之、壓榨殘殺毫無顧恤，一方面又長期向台灣人民顯示「大和」民族的優越感，並以「皇民化」來「去中國化」。如此一打一捧，年深月久難免不「深化」人心，使台灣人民心靈造成戕害、心態受到扭曲。噩夢般的殖民統治遠去了，但時至今日，有些台灣民眾面對日本人時，仍有心理障礙。當亞洲國家都在對日本篡改教科書事件和小泉純一郎堅持參拜靖國神社發出怒吼時，香港《鳳凰週刊》的特約記者在台灣採訪，對一些民眾「皇民化」下的心態，讓人「常常不期地悚然一驚」。²⁰

更讓兩岸人民吃驚的，還是台灣政界人物的扭曲心理和拙劣表現：日本軍國主義逼迫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一百周年時，一些「台獨」分子趕到日本馬關春帆樓，公開感謝當年日本對台灣的佔領；2004年11月，台灣「教育部長」杜正勝在記者會上盛讚日據時期日本對台灣的殖民教育；2005年4月，台聯主席蘇進強在日本訪問時赴靖國神社參拜；此外，台灣當局還欲支持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三 在兩岸反獨促統之路上，「皇民情結」是必須正視並先行破除的魔障之一

站在現實的堤岸審視歷史，我們固然要對「皇民化」的沉渣泛起及種種逆流蠢動時加警惕，絕不可掉以輕心，但也要樂觀看到，絕大多數台灣人民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下，不遺餘力地抵抗著「皇民化」，這是兩岸反獨促統的重要力量。

以所謂的「皇民文學」為例。它在1937年後給台灣新文學帶來的浩劫、摧殘和對台灣人民精神上造成的窒息性傷害，罄竹難書，於是，抗拒、批判「皇民文學」就「成了台灣新文學發展的極為重要的主題」²¹。但李登輝執政不久，就有意識地復辟早被釘死在漢奸文學歷史恥辱柱上的「皇民文學」，縱容日本右翼學人在台灣大肆活動，並藉此大搞「文學台獨」，以台灣文學的「本土化」、「自主論」、「主體論」來否認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

在此氣候下，早在日據時期就為「皇民文學」唱頌歌的葉石濤，繼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兩次為「皇民文學」辯護之後，於90年出版《台灣文學的悲情》一書，更是毫不掩飾地為「皇民文學」翻案，千方百計為其日本恩師、日據時期「皇民文學」的大總管西川滿所創《文藝台灣》塗脂抹粉。緊接著，台灣文壇分離主義的另一代表張良澤，於1998年整理、刊出40年代

的一些「皇民文學」作品，並拋出「皇民文學合理論」，並撰文鼓吹「設身處地」、以「愛和同情」重新解讀這些作品。顯然，這已不是學術領域裏的是非問題，而是在為日本殖民統治張目。面對「台獨」思潮「親日仇華」傾向在文壇的叫囂，以台灣著名愛國文學家陳映真為代表的文壇統派力量奮起反擊，在台灣文壇樹立起反「台獨」的鮮明旗幟。對那種想要高攀「皇民」而對自己體內流動著的畢竟只是台灣人的血而感到絕望的情意結，陳映真等稱之為「精神的荒廢」，並指出：「只要沒有經過嚴峻的清理，戰時中精神的荒廢，總要和現在產生千絲萬縷的關係。」²²一針見血地挑明瞭當年的「皇民」、「皇民文學」和現在美化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獨」言論的某種內在聯繫。

在「皇民文學」沉渣泛起之時，日本一些右派學者和文人趁機大加美化。1998年，號稱「日本現代中國文學的權威」之一的日本東京大學教授藤井省三，在東京出版《百年來的台灣文學》（台灣中文版名為《台灣文學這一百年》一書，公然為「皇民文學」招魂，意在鼓吹「文學台獨」。台灣著名作家陳映真針鋒相對，發表《警戒第二輪台灣「皇民文學」運動的圖謀——讀藤井省三〈百年來的台灣文學〉：批評的筆記（一）》等文迎頭痛擊。值得反思的是，北京一家報紙受到蒙蔽，不辯美醜，在2004年10月15日刊出一篇題為《台灣文學入門之書》的署名文章，荒唐無比、糊塗至極地「吹捧一個為皇民文學招魂以鼓吹『文學台獨』的日本右翼反動文人」。台灣、日本某些作家為「皇民文學」翻案的反動逆流，皇藤井省三其人其文其書，連同北京那家報紙和糊塗書評人的錯事，莫不「警醒了我們中國內地的文學工作者」，「不能等閒視之」²³。

縱觀歷史演變過程和脈絡，可以這樣說，「皇民化」基因下催生的「皇民意識」和「皇民情結」，是「台獨」主張的一翅兩翼和重要根基。時下鬧得最凶的「台獨」漢奸，多系日據時代「皇民教育」畸變的「順民」或者怪胎。討論兩岸未來前途，要正視現實、著眼未來，但也不能忘記過去。破除「皇民情結」固然是反獨促統的當務之急，但對一般民眾心中因心靈創傷而殘留的「日本情結」，則要區別對待，不能概以「皇民情結」視之。化解清除這個歷史頑疾，除了親情撫慰，最好的辦法就是耐心地以春風化雨方式，幫助廣大台胞樹立對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政治文化的信心，在加速經濟發展的同時，盡快在大陸建立起一個富國強民的和諧社會，完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以五千年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為雄厚底蘊的中華民族精神，是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精神財富。中國歷史上曾出現多次分分合合，但最終仍能走向統一，不僅因為統一是中國歷史長河的主流、發展的必然歸宿，還在於它溶鑄在每一個中國人的骨髓裏。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面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巨大親和力和強大凝聚力，「皇民化運動」之餘緒早晚必被歷史巨輪碾除無遺，化為齏粉，蕩滌無遺。那些逆流而動的「皇民」餘孽和「台獨」死硬派，到頭來只是在一枕黃粱之後，哀其不軌圖謀和個人政治目的灰飛煙滅，悲其無從逃脫的歷史嚴懲。

註釋

- 1 蘇新：《憤怒的台灣》，載《台灣同胞抗日50年紀實》，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編，中國婦女出版社，1998年，19頁。
- 2 轉引自安然：《台灣民眾抗日史》，台海出版社，2003年，154-155頁。
- 3 王詩琅譯：《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序說》，{台灣}稻草出版社，1988年，5頁。

- 4 張一之：《台灣義勇隊及其早期工作》，載福建省檔案館、廈門市檔案館編《閩台關係檔案資料》，鷺江出版社，1993年，252頁。
- 5 王曉波：《抗戰時期台胞的血淚與奮鬥》，載《台灣同胞抗日50年紀實》，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編，中國婦女出版社，1998年，257頁。
- 6 日本警務局：《台灣員警沿革志》，轉引自吳三連、蔡培火等：《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台北}學海，1979年，161頁。
- 7 王雲五主編、鄭喜夫編撰：《民國連雅堂先生橫年譜》，{台灣}商務印書館，1980年，252頁。
- 8 轉引自王曉波：《不容對「二二八」進行歷史強暴》，《人民日報·海外版》2005年2月28日。
- 9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台北}三民書局，1977年版，4頁。
- 10 楊壽：《記台灣光復之初》，載《南方週末》，2003年1月24日。
- 11 吳國安：《論台灣同胞參加祖國抗日戰爭的活動及其歷史意義》，載《近代史研究》，1986年3期。
- 12 孝紹：《試假定我是台灣人來提出三項管見》，《台灣民聲報》，1945年6月16日。
- 13 柴田廉：《台灣同化政策論》，{台北}晁文館，大正12年版，50頁。
- 14 葉石濤：《走向台灣文學》，{台灣}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90年，14頁。
- 15 若林正丈著、雷慧英譯：《戰後台灣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變化》，載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台灣研究集刊》，1995年第1期。
- 16 香港《快報》，1995年7月10日。
- 17 香港《快報》，1995年7月10日。
- 18 趙潔：《日本在台影響有多大》，載《環球時報》，2004年10月6日。
- 19 丁雯靜、何燁、李怡志：《台北口述實錄：侵入我心的日本……》，載香港《鳳凰週刊》，2001年45期。
- 20 丁雯靜、何燁、李怡志：《台北口述實錄：侵入我心的日本……》，載香港《鳳凰週刊》，2001年45期。
- 21 呂正惠、趙遐秋主編：《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昆侖出版社，2002年，7頁。
- 22 童伊：《藤井省三為「皇民文學」招魂意在鼓吹「文學台獨」——評〈台灣文學這一百年〉》，載《文藝報》，2004年12月16日。
- 23 童伊：《藤井省三為「皇民文學」招魂意在鼓吹「文學台獨」——評〈台灣文學這一百年〉》，載《文藝報》，2004年12月16日。

鍾兆雲 1969年生，1990年福建教育學院畢業後，在中共福建省委黨史研究室工作。1995年12月獲助理研究員職稱，後改行政。已在海內外出版《劉亞樓上將》、《農民知己鄧子恢》、《奇人辜鴻銘》、《賀敏學傳》、《國之大殤——台灣禦侮報告》、《落日——閩台抗戰紀實》等專著二十餘部，出版和發表字數近900萬字。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五十期（2006年5月30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